

忘山居士的沉思

● 朱 正

忘山居士孫寶瑄留下的日記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書。

日記中說：「夜覽《永嘉禪師語錄》，〈答朗禪師書〉有云：先須識道，後乃居山。若未識道而先居山，見山必忘其道；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，但見其道，必忘其山。忘山則道性怡神，忘道則山形眩目。是以見道忘山者，人間亦寂也；見山忘道者，山中乃喧也。至言，名言。余因自號忘山居士，名其廬曰忘山廬。」以忘山自號，也就是他自負已經見道識道了吧。這裏用的是佛家的典故。但是人們從日記裏看到的，他所見所識，決不只是佛教之道。

無論怎樣詳盡的思想史，大約都不會寫到孫寶瑄其人。思想史上的人物，總得構成自己的思想體系，至少，總得多少提出一些前人沒有提出過的新思想。這一些孫寶瑄可是都沒有。日記中那些吸引着今天讀者的意見，都是來自「西儒」如盧騷、孟德斯鳩、斯賓塞的著作。似乎不好稱他做

思想家。雖不是思想家，卻也還是在思想的。他生在晚清，武昌起義那年三十七歲。二十歲時候遇上了甲午戰爭，這正是多事之秋，因此也正是激起人們思考的時代。這部《忘山廬日記》，可說是一部思考時局的記錄。它不止反映了孫氏本人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的沉思，還包含了他的朋友如康廣仁、宋恕、夏曾佑、章太炎、梁啟超他們對這些題目的思考。我們且來看看他們是怎樣想的吧。

論皇帝：夏曾佑說的：「賊盜者，其行為；鬼神者，其體制；鼠竊者，其心術；皇帝者，其名號。中國自春秋以還，天下之君主多變盜寇。至戰國末，諸盜為一盜併。自是而後，或分或合，卒成以盜易盜之天下。而諸儒方爭盜統不已，如辨正統及非正統，尤可笑也。」宋恕說的：「儒家宗旨有二：尊堯舜以明君之宜公舉也，稱湯武以明臣之可廢君也。」

論篡竊：「吾謂後世之君，位置太高，雖公侯皆望之如帝天。其意實

防篡竊。然而篡竊者，一家之禍耳，生民之利害不繫於此。何也？觀於陳氏之篡齊可知矣。然則凡君之重抑臣者，名為天下大計，實私於一人一家也。」論者皆以篡竊為罪，不知當時凡臣之能代其君者，其才略德器實過其君什倍。以公舉之理而言，則司馬炎、劉裕、蕭道成、蕭衍、陳霸先、楊堅諸人，皆在應舉之列。是時守成之主既昏懦而不勝任，理當禪於其臣，其臣代之亦於德義無虧。而世儒認認痛詆，以為悖義傷教，亦何所取耶！夫君為民而設也，君稍庸暗，民已不勝苦，況如東昏叔寶之荒亂者耶？而猶曰臣宜守節不可代之，此真宦官宮妾之見也。」

關於君主的權力：「君主一統之世，民固無權，其君亦未嘗有權。試觀《漢書》載元成累下恤刑之詔，而有司不能廣宣主恩，至有鈎撫細微，毛舉塞詔之事。《宋史》載仁宋累有綏民之政，官吏罕有承帝之意者。由此可見君權有時不能伸也。見於史尤顯著者惟此，其所不載者可類推矣。或曰：然則權何在？曰：權在為惡之人。蓋欲為惡，則無論君民皆有權；欲為善，則無論君民皆無權。法使之然也。」

論太平天國。宋恕說的：「粵亂之起，本朝一大變也。其始皆由所用官吏殘虐所激，民不聊生而亂起。從不聞殺一人以謝民，此大不平之事也。」同情的顯然是太平天國這一方。可是，如果太平天國終於勝利了又怎樣呢？孫寶瑄說：「世但知責曾胡左李佐異種以自殘同種，不知洪楊得志於天下，豈能變法以救民耶？依然專制政體，擁據十八行省，凌壓四百兆人而已。」

就在這一段日記裏，孫氏提到有

人有一種設想，如果那時李鴻章乘機稱帝，情況會不會好些。梁啟超的《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（一名李鴻章）》中寫了一則軼事：「戈登嘗訪李鴻章於天津，……戈登曰：中國今日如此情形，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，除非君自取之，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。君如有意，僕當執鞭效犬馬之勞。鴻章瞿然改容，舌撻而不能言。」不要忘記，孫寶瑄是李鴻章的侄女婿，可是他並不贊成此說，他說：「吾恐戰勝功成之後，仍不免襲二十四朝之舊軌，為億萬年子孫金城湯池之業，但於政治中略變其面貌，效法歐西耳。而臟腑中之朽壞，依然不動也，則亦何貴其能自帝乎。」他甚至認為，就是變法這事，也不能寄希望於他們。日記中提到，梁啟超「責曾胡左李諸賢能為國民定亂，不能為國民圖治」，孫氏回答說：「曾胡左李既不聞歐人政治本原，其不能變法，為國民圖治，情有可恕。任父猶責之，毋乃多事！」孫氏心目中的變法圖治，指導理論是歐人政治本原。所以日記中對《人權宣言》的一些內容表示了很大的興趣。

這部日記中，有趣的議論還還不少。例如：「至平之世無史，至樂之民無詩。史者，有事而書也，世平無事，故無史。詩者，有鬱而發也。民樂無鬱，故無詩。」這裏也顯出了他的大見識。

朱正 1931年生於長沙，年輕時在當地報紙做編輯和記者。1957年以後脫離正常社會生活二十餘年，後來繼續從事出版工作。著有《魯迅傳略》、《魯迅回憶錄正誤》、《人和書》等。